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新 9 號

祇供參攷  
請勿發表

行政院新聞局編譯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十日

鐵幕的真意義

本文譯自六月十四號晚郵通訊報作者湯奈斯赫賽氏 (Conrad O. Howard) 為美國著名新聞記者其評論家過去三年曾任該報駐歐通訊員專事探問關於歐洲政情之文章。本文即係其當地觀察的報道。

NOV 5 1947

當一九四五年英國大選結束，勞工黨以壓倒優勢獲勝後不久我在倫敦遇到一個議會和保守黨中二位要員討論關於戰後歐洲政治趨向的問題。痛心於保守黨的失敗，他直覺到最近的將來會有比單單是社會主義更大的禍害發生。你信不信，他激動地說：「而在他那華麗公寓房間的地板上跛着方步，那般共產黨人就要來替了。祇管社會主義者一垮台，他們就會混進來的，正和二十五年前列寧取代了凱林斯基(註)一樣地確實，到那時候，你我都將無能為力。」

為什麼，我問。

「因為共產黨人的確有一套試問我們有些什麼呢？我們能供給一些什麼給英國人民呢？或給歐洲的人民呢？我們所能給他們的，就是維持現狀——回復到從前的老樣子。可是那般共產黨人，天曉得，却能提供許多從前沒有實行過的思想與方法，他們的確有一套把戲。」

這種共產黨人確有一套的感覺，今日在歐洲已傳遍各處。蘇聯已建立了一種共產主義正在進展而其他則正趨沒落的觀念。歐洲各處的人民，自魯爾區的煤礦工人乃至雅典的攬油大王，都真的相信它。這是我任本報通訊員逗留歐洲三年帶回國來的惟一重要的印象。

回美暫時休息的期間，我發現國人對於歐洲情勢異常關心，而有時我見得很難將那極度混亂的真實景象表達出來。我的朋友們曾問過我很多的事，但最使他們注意的，乃是所謂「鐵幕」的問題。它將歐洲割裂為二的實際作用是什麼？對

「普通歐洲人民的住在鐵幕這一邊抑那一邊，又有什麼分別？」

「要明瞭鐵幕的真意，祇要當你想當你翻越落磯山顛大分水嶺時的那種情景一雙翻過你便會發現那裏受到一種新的引力法則的支配。每一滴水，每一條川溪或河流都在趨向於一個最後的目標——偉大的太平洋。同樣地，每次我從鐵幕的西邊穿到它的東邊，也可以觀察到一種新的引力正領導着每個人的思想與每一種公私性質的活動歸向於莫斯科。」

「在鐵幕之中——將蘇聯支配下的歐洲與大陸其他部份割開的假心界限——我發現了一種可驚奇的穩定狀態。在它外面，我所看到的祇是紛擾與混亂。或者有人可以說這乃是地獄與淨土的區別，蘇聯的「穩定」正是一種永久沉淪的穩定。但這樣說實在嫌過於單純。蘇聯征服的不可移性以及共產主義所帶來的新的意向，已給予飽經患難的歐洲人民追求安全保障的渴望以某一種程度的滿足。至少他們已知道他們所走路線的方向。」

「譬如最近我曾到蘇區德國去參觀。比很大的普魯士人將它分為三十六塊個別的耕地，而三十六個以前是佃農的德人現在便成了這些面積雖小但肥沃的田畝的主人。當他們的住所仍在建築中時，他們和家便佔居了那些已被清算的貴族的府邸。這些農民中的一人，一個愉快的退伍士兵，送我那蘇籍導員——一個在情報組織的少校——不注意時，將我拉到一邊，說道：『也許你看到我們德國人會受那些屬於考考等民族的俄人的指教而驚異。但是相信我，我們正給了我們所需要的。有了他們的幫助，我們不必再為生活而擔憂了。這種信心的表示，由一個能為自已設想的人的口中道出，是今日自由歐洲所不易見到的。』」

「當然不是所有鐵幕後面的人民都已在這冷酷的環境中得到了安寧。成千成萬的生靈在一種悲慘與虛度的希望中，仍在夢想着能獲得西方民主國家的解放。現已屬於蘇聯埃集團的某團的一位英國大使最近曾碰到一獲位他正與困難的某他的汽車在一處山邱中發生了障礙。那些邱民在修理汽車的時候，他到這近一間草屋中去喝杯咖啡談談天。當他說明他是誰後，那些人問道：『英王與特會來解放我們呢？』」

「這位客人正在思索一個妥善的回答時，一個有鬚的長者莊嚴地發言道：『先生，這這祇是一處貧苦的鄉村，但你能替我們設法從共產黨手中取得解放，我們定將送你五十條山羊和五十條綿羊。』」

「我很快地便逃走了，大使告訴我，這委實不是一件玩笑。」

「去年某幕後國都城也發生了類似的情形。那裏的瑞士公使館曾被大羣與

奮的訪問者所包圍他們要探知三十萬美軍業已集中瑞士準備前來解放該國的消息是否確實。關於三十萬美軍一點是確實的，公使館的職員向他們宣佈，但是抱數得很，他們都是專為去觀光的。

又如當我們最近訪問蘇區德國的市鎮鄉村時到處都有群眾圍聚着我們所乘汽車的四周做出種種動人的神情，而我們不由不想起我時在法比兩國所見到的情形來。我們是否以解放軍前鋒的姿態到歐洲來的呢，但就一般而論，我發現東歐大部份群眾深知「解放」仍須視做是一種夢想，祇能忍耐地仍和那「巨獸」同生活着，他們曾竭力使它不要露出那狰狞的面目來，並繼續成功地防止它的吃方。

在鐵幕西邊其它的東邊，生活的真正區別在那古及蘇區歐洲的普通人民也許不曉得他們有兩種權利已被剝奪了，這兩種權利大多數西歐國家的人民是仍能享受得到的——人身保護權與僅僅做一個旁觀者的權利。這兩重剝奪比較在化地區的一般目的，更能表明這兩個世界的不同。

在「大分水嶺」那一邊的各地，都有一種組織嚴密精密的秘密警察機關在平穩的效能下執行着可怕的任务。當清晨五時，居民的門鈴必響動後那些被目為法西斯專制餘孽的人民便如同是捕鼠機中的老鼠一樣，被帶到「再教育」的會，清晨三時的門鈴響聲已成東歐的一種新的音樂。這夫銳共劃一性的聲浪，正如德國的粹興起時所有的情形相彷彿，奇怪得很，芬蘭國會春念「民主情緒的勃發中，最近對人身自由一問題舉行了一次冗長的辯論，結果秘密警察必低頭無法地答應來調查這椿事情，這正如在撒哈拉沙漠中討論泉水的品質一樣，一位在場者告訴

同樣的，今日在鐵幕表面絕不可能過一種中立的政治生活，而對於保留一個旁觀者地位——或熱熱派——的否認，已在每個人的生活，中刻下了一道深刻的傷痕。那是我們的目的，南斯拉夫某政府官員向我道：「將新的共產理論灌注到整個國家中，絕不能有一個人置身局外的。」

將共產主義予以普及是蘇聯集團中每個傀儡政府當前的計劃例如波蘭的新憲法，特別指明政治委員會的制度必須推行至窮鄉僻壤間，沒有人能逃避。在每一處市區，每一家公寓，每一個辦公室，每一所工廠中，總有一個黨的幹員，以監視人民的行動。每一個鄉村內，黨的地方委員會都顯示着同一體生活的規範，假使你往遠逃避兩次以上的集會，你很快地便會發覺像你這些「三五分子」將招致怎樣的結果。人類兩千年前，在希臘開始勝利的前進，現在則已失去了單獨想生共思想的

權利或者僅僅是懸坐不動的權利了。

他們悔恨嗎？未必見得。也許一般美國人不易將解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廢難後歐洲一般人民精神上的苦悶情形。今日歐洲的智識階級男女不問居住於一個國家都有一種本身完全處於困惑的深淵中的感覺，差不多一應舊有的價值都已消失了。他們周遭的世界正經歷着迅速的变化，而祇有教會與共產黨似乎是屹立於漩渦之外的兩座碉堡。然而前者的缺憾是它祇供給精神上的慰藉，至於共產主義則顯示它是一項迎合大眾需要的理論，能予每個人政治上思想上經濟上的各項問題以十分適合的解答。這種能使大眾獲得愉快生活的誘惑，不是基本上生於資本主義世界中的大部份美國人民所能充分領會到的。

「我們不必否認共產主義對於任何問題都有它的解答，」一位海德堡大學的德籍社會學教授和我說，「我以為這種解答是錯誤的，但是許多人却以為它總比根本就沒有解答好些。我曾和很多西歐人會談過，他們對於過度的困惑與煩惱，照我看來，簡直應去請教精神病專家。可是他們並不這樣做，為了解脫心理上的桎梏，他們却決定了加入共產黨。至少我自己可以不必再苦苦思索了。」他們中間一個年近深亮的法國女郎想白起向我供認。

雖然如此，但是蘇聯如欲赤化西歐的話，却還沒有現在赤化東歐這樣地容易。幾乎所有在「大分水嶺」以外的東歐國家，都已達到可被控制主義者征服的階段。歷史已準備了這條路。在推行共產主義的三種障礙——教會，具有自由思想，的布爾喬亞階級，與社會民主派的工人運動——中，祇有教會在東歐還保持着它的勢力。然而在液立的情勢下，它可能毫不費力地便被解決。這祇要看南斯拉夫天主教「蒂貝奈克」(Tibetsek)被審判一事便可證明了。

東歐的人民是樸實而又簡單的。這些在蘇維埃集團中的國家社會情形沒有西歐那樣複雜。因此它的進展也很遲緩，而且雖有着中產階級，但為數既少，又缺乏傳統勢力，以至使蘇聯覺得逐漸消滅的必要。都沒有。照我看來，祇要東歐人民仍將出賣土產武器，攝影機，提琴等的收入來換取一片麵包或一杯咖啡，沒落的中產階級還會繼續苟延下去的。總之，早在東歐未被赤化以前，它那近於封建的類型已和西方文明有了明顯的分歧。至少在教化的意義上來講，那裏一直便有着「一層鐵幕」了。

到一個蘇維埃集團中的國家去旅行，正如到一個很大的消化器官中去觀察。一直接使到那裏，你都會看到那消化液汁在工作着。即使當我們的政治家正和那些嚴冷的蘇聯代表們斤斤地爭論着戰後歐洲制度的各種細目時，蘇聯在悄悄

地完成它將東歐納入自己軌道中的工作。在那些已成「囊中物」的國家裏面當地  
黨的共產黨員推行工作的順利，已使蘇聯的監管減至最低限度。消化工作差不多  
已完成了。在蘇區德國政治經濟方面已達到一個階段。紅軍隨時都可以撤退，而  
讓德國共產黨員們來負責管理。德國東部的工業現情已入蘇聯管轄的龐大  
企業同盟掌握中了。無論在那裏，中產階級都已窒息，死，大多數的地方行政機  
關，都已被德國共產黨員所操縱了。

在許多我所遇到的德國共產黨員中，有一個曾請我吃過飯的小工業市  
波蘭登堡的市長給我的印象最深。他是一個傳奇式的革命人物，曾受過很好的教  
育，其訓練並且個性異常強強。在黨中，他的資格很老。納粹政府過去曾把他送入  
感化院，却沒有把他關進集中營。因此希特勒難死而他依然活着。要使我的德國  
同胞看法和我們一樣，現在還有些困難。他呷乾一杯伏特加酒後向我傾訴。前兩  
天一家紡織廠的工人們曾給了我一些麻煩。他們聽說工廠是為了社會的公益而生產  
的。於是他們決定將大部份製就的布疋都帶回自己家去。因為這就是共產主義。  
你且想想看，然而，我們正在逐步解套。他繼續道：共產主義不久必會在這裏紮  
下穩固的基礎。接着它將伸張到全歐洲，再過不久它更將推廣到美洲去。另  
外一個共會的美籍通訊員玩笑地將一首納粹歌曲來提醒這市長。今天是德國，明  
天便是去界。可是我們的主人並不能領會這笑話的涵義。

像波蘭登堡市長這樣的人增加一萬個，你就可以有一個較清晰的概念。這  
些在鐵幕以東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們——據說蘇聯政權的將校官位們——  
構成的該是怎樣強的一個政治體系了。

西歐的情況若和這典型思想大量生產的東歐相比，是迥然假使你在鐵幕  
以內的歐洲地區仔細觀察一番，第一件將使你注意的事，便是那三天的缺乏一致性。恰和  
蘇聯集團區的團結相反，自由歐洲的外型看去是異常地凌雜與散漫。它的裏  
面有右翼政體的西班牙共希臘，不偏不倚的民主國家瑞士，荷蘭，英國，以及社會  
主義的英國等，並沒有一定的規範。

在這凌雜散漫的型態下，人們似乎全在大混亂中打着旋轉。我們很難斷定  
他們究竟期望着什麼，但明顯地，他們是在期望着一些他們可以信任的東西。他們並  
未發現新的理想，殘酷的戰爭與戰後一切紛擾的現象，已使他們大部份對於一些舊  
的理想發生了懷疑，包括那使他們祇能報之以苦笑之民主主義。有一次在蘇聯普隆  
快車上我遇到一個意大利商人，他告訴我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當然它不是那種戰爭一經結束問題便可解決的鬥爭。雖然人們在火車上似乎習慣

他若敢發揮關於時事的奧妙意見，但這人確是表明了一個使許多人困惑的思想，而歐戰中緊張的情緒，使我們不由想起慕尼黑危機時代的氣氛，同來有些什麼已在這過度的空氣中醞釀着了。這是一種戰前而非戰後的心理狀態，他們並沒有在那裏養養蘇息，却在那裏磨掌擦拳，以待時機。

今日在歐洲社會間，除衣食問題外，第三次大戰乃是主要的談話資料，無論在荷蘭的鄉村間，維雅典街邊的咖啡館中，梵蒂岡的議事室裏，或巴黎上流社會的交際場合中，人們都在談論着它在今日的無可避免性。一位歐洲的極端主義者甚至曾特為我描繪了一張下次大戰的戰略圖，那上面標明「盟國」企圖扼守西貢，英意大利，同時蘇聯的隊伍正在攻取歐陸的其他地區。

在這絕望的動盪中，歐洲各地的人民惟有將希望寄託于美國回國以後我發現許多朋友都相信美國在大西洋彼岸業已失去了眾望。這全然不是那回事，誠然有些歐人現時說，我們期望你能給我們帶來自由與新的希望，直到今日為止，你所做到的不過是將希特勒擊敗而已。這雖是偉大的成就，可是却還不夠，但還是一樣的，美國仍是黑暗中一隻友誼的手，歐洲人民心中仍在燃燒着美國將幫助他們的熱望。這乃是他們僅有的一線希望，因為英國現今正遭受着尖刻的政治試驗的磨難，而且至少暫時已失去了它歷史上一向保持着的仲裁歐洲糾紛的作用。美國未能使歐洲得到那些過分標榜的自由，這種失敗——替他們解除希特勒的桎梏是例外——不能歸咎於總統或軍事領袖，比較恰當地說，它乃是美國自着手歐陸大冒險以來，人民腦海中深印着的一種觀念所造成的結果。一種歷史氣氛，其教化影響而成的結果，差不多所有的美國人都仍然相信，人們如自來縛中獲得解放，將自動地歸向於傑弗遜式的民主主義。這情形在美國革命時確曾發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同樣的情形並沒有發生。美國以解放者的姿態來到歐洲，並沒有使歐洲人民相信美國的民主政治能在那裏適用，而且美國也未能建立可以推行這種主義的態勢。

我們所供獻的一切都不是積極的，駐巴伐利亞的一個美國行政官曾觀察所得向我說道，我們所採用的一切方法似乎都是和歐洲人民作對的，而不是替他們着想。我們始終站在被動的立場上，我們的最高當軸自始便祇關心戰後怎樣在歐洲和其極主義鬥爭，却未曾料到因此已送給我們的蘇維埃敵人一份比任何方式的鬥爭所可獲得的更可貴的產業——主動力。

這種消極的政策的一個頭例，是戰爭終止後不久德國美軍佔領區中政黨的復興與選舉的舉行，主要原因是美國行政當局雖然認為時機尚未成熟，但

小販在它的佔領區內已有了這項措施，於是便不得不趕快跟着效顰起來。

在他們不顧一切以對抗共產主義的渴望中，美國當局有時會和極端右派相聯合的確，這是很少出之於熱忱的，正因為美國人民中很少喜歡那些仍舊堅持着右翼思想的特殊集團的政人，那些特殊集團的政人並非意識善良的中等階級，而是一般貴族與鉅富們，經過這次戰爭，他們的身體、財產和觀感却依然奇妙地未受損害，以一個團體來講，他們對於一個新興的健康歐洲不會有什麼貢獻，他們中間許多人的思想是自私近於人禍派的，僅僅想自美國人的幫助中，再恢復戰前在泰維拉蒙華的大飯店中所過的那種日常生活。多數美國人不能了解大部份歐洲人民情感與思想上的傾向，因此這一個集團看起來，真好像是共同抵制共產主義唯一可靠的同盟了。

我們有些政治代表們，受了這些偽善的朋友的慫恿，在歐洲曾竭力使私人企業復蘇，也許這是自然的趨勢，因為這正是我們國內所深信的一種制度，但大多數歐洲人民知道，他們那種乏其狹隘的領域中，再不能培養這種奢侈的樹木了，要使他們，它在他們乾涸的土地上繁榮成長和移植熱帶的梓木到北極去一樣地不可能。他們的國家是廣大而又富庶的私人企業，可以在你們美國發展，歐洲商人有持向美國人說：「原則上講來，我們也喜歡它，但實際上，從現在起，我們不得不採取某種形式的計劃經濟了，他們的說法正如同是船隻遇險，一羣乘救生艇逃生的旅客，在沒有安全之陸之前，祇能啃着硬麵包維持生命一樣。」

據說今後歐洲政治方面的選擇，不在於左傾或右傾，而在於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之間，要證明這項判斷，不必繞很遠的圈子，右翼的政治領袖們原則上都認為祇有其種集產主義可以挽救他們的安界，在英國最近那次撼動國家經濟基礎的煤礦工潮中，反對派的保守黨攻擊勞工黨，譴責它的理由是計劃得太不週密，而非過於週密，當那次危機將近終了時，我有一個機會在下議院的休息室中徵詢他們的意見，那保守黨的代表向我道：「要回復到你們在美國所享受到的那種自由經濟將使這個國家在一夜之間立即崩潰，在英國，那些日子是不會再來了，我們今日所堅決主張的，祇是睿智的計劃而已。」

事實上，即使以全世界的全面計劃，已瀕破產的歐洲是否能夠復興起來，似乎仍是一個疑問，你如研究奴隸勞工的問題，而看到近年來的歐洲經濟，靠它維持至何種程度，必然會覺得怵目驚心，每一個人都知道，戰時德國所以能夠維持得那麼長久，乃是由於在它的工廠中有幾百萬停廢在做工的緣故，今日歐洲其他國家也在利用着強迫勞工，南斯拉夫顯著的工業復興紀錄是徵調勞工的直接結果，英佔領區

內的魯爾工業區一直到幾個月前，幾乎所有的礦工都是強迫勞工。在法國，現時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煤礦產量是德國戰俘的成績——其中有四十萬德人是由美軍轉借的。這些德人法國絕不願將他們放逐，而英國現時正在歐洲物色大批契約工人，特別是礦工。這些絕望的處置方法僅僅表明了戰後歐洲的狼狽狀態。它對於願意多端的敵人勸告美國人不要繼續在國內發展私人企業，而如要幫助他們的話，不要阻撓他們實行有計劃的經濟一點，是一項爭辯的確證。

其間蘇聯在歐洲的戰略是怎樣的呢？它將如何向那些千百萬仍然自由的歐人進行其爭取他們信仰的戰鬥呢？

蘇聯現時的直接目標，乃是將德國在思想上予以克服，阻礙國際間對於德國問題獲致協調的原因，就是蘇聯的這種願望，而不是關於賠償、工業生產、魯爾區的統制權等的爭論。德國是所謂「爭執的焦點」——在這裏東方與西方的決定性戰爭已開始了。蘇聯希望以統一德國來贏取勝利。這種統一當然得完全合乎他們的條件。一位蘇聯的英國行政官曾解釋：關於政治上統一德國，蘇聯可能再獲得一個受它控制的傀儡。照一般揣測，新的德國政府仍將設在柏林——所以說也，在鐵幕的裏面。蘇聯將採用它過去的戰略，設法爭取新政府中幾個重要部門，不久之後再迫使整個政府照它的方針行事。同時，蘇聯的宣傳機構在每個德國鄉間也將加強運動，而由於德國人的性格在政治上是一羣綿羊，因此也可能獲得一些成就。當這舞台完全佈置好後，整個德國將有一次「自由」的選舉，結果極端左翼必會以百分之五十的票數獲勝。告訴你，這便是所謂民主文化的選舉。

蘇聯將德國降為蘇維埃聯邦內的一個共和國，因而一路將鐵幕推動至萊茵河以後，它祇須實施馬克斯的既定方案，就可征服歐洲。馬克斯與恩格爾（Engels）都是德人。共產黨宣言，雖則最初是在英國發佈的，但它是一項德國的文件。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們心目中的共產革命，原是為了技藝精巧、受過教育、共聽領袖的德國勞工而設想的。階級鬥爭的真正旗手，便是這些德國勞工，而不是那些笨拙與沒有受過教育的俄國農民。他們總是成主無產階級獨裁的人，而不是那些新自俄國封建社會中解放出來的奴隸。然而一種歷史的機轉將基礎移動了。逃亡在瑞士的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乘著德人為他預備的火車回到了俄國。開始在他自己的腳土上推行起共產運動來。那一時期的觀察家們相信，列寧希望一俟他在東方燃燒起革命的火後，德國也將在那色的煙霧中跟蹤奮起。可是正在那時候，半民主色彩的威瑪共和國却取代了它，並且不久政權又被希特勒所攫得了。

因此，今日德國如被赤化，可說是馬克思主義終於回到了「老家」。德國果真赤化



其他西歐國家在蘇聯看來都將不值得視為問題。許多美國人有鑒於今日歐洲的危機深重，當我回國後曾告訴我，他們認為拯救歐陸免被赤色浪潮吞噬滅實是一件極緊要的事，但是怎樣拯救呢？在今日之下這可能從蘇聯手中奪回主動嗎？杜魯門主義計劃以金元麵包供給蘇聯來扼守陣線，也許可以延滯這浪潮的進迫，但是卻不能阻止它。今年春天我們在希臘的幾個美國人感到總統的措施去似乎像是一個人發覺錯過了一輛公共汽車而決定放棄一空飛機，他對於希臘政府的援助計劃果真能和希臘那些游擊隊長們心靈上的熱忱共對主義的信心相抗衡嗎？

思想必須用思想來對抗美國人不天相信今日歐人思想上的飢餓遠較需要麵包為甚，然而這是確實的。在我們保持着歐洲的陣線以對抗蘇聯的企圖中，我們甚至連思想的武器都沒有開始應用。最近在梅恩·羅斯的弗蘭克福 Frankfurt 我化了一天功夫和一位美國高級的商務行政官討論共產浪潮的問題，他繞過避了一次，然而對於他所說的西方勢力在思想界上無條件投降一事感到相當煩惱。我常常想，他道：「我們這民主主義真是一件好東西，為什麼沒有人替它來宣傳？」我們大多數在歐洲的思想前哨，祇是由若干工人負責供應，應不完備的新聞處與閱覽室所組成，而且限於做細的預算，祇能勉強維持工作，同時蘇聯宣傳的大鎚正向每一個地方有力地打擊着。美國負責對外宣傳的助理國務卿威廉·賴士頓 William Benton 最近聲稱這種宣傳無異是一種「心理戰爭」，現在正向我們展開全面的攻擊。據最近的報告，蘇聯所消耗於政治宣傳的費用——多數用於歐洲——正相當於其餘世界各國所消耗的總和，而每一虛布都得到了它的效果。在全歐洲莫斯科可以仰賴共產黨完備的機構，可以信託黨在各聯合政府中佔據要職的代表們，可以憑藉共產黨對於勞工組織的支配權——這在那些關係全局的國家如法國、意大利東面，已經成為事實了。

單憑宣傳當然不是問題的解答，我並不企圖勸告世界怎樣來療治它的病症，但我雖不曉得任何挽救世界的特效藥，我可以告訴那般以迫切的問題向我尋擊的朋友們，一些我有特想起的答案來。也許美國可以多遠送一批受過訓練的國民到歐洲去——一批具有較高資格對於歐洲的歷史、語言以及各種問題都有充分認識的人，以代替部份現時駐大西洋彼岸的不能稱職的代表們。也許這批人可以試行幫助那些最感困難的歐人，採取和他們相同的觀點，而不與潮流相背。也許他們可以帶着兩種態度——一種是對資本主義與私人企業方與未艾的美國的，另一種則是對窮苦與流離的歐洲的，在那裏救濟工作必須安于籌劃。也許他們可以使自己的觀念調和起

來就是在決定本國的政務時不好「保守」而在幫助歐洲時則可成為溫和的「社會主義者」。

現時留駐自由歐洲的許多美國人，照我看來，正和一群不當的人週旋着，想替他們回復那些動搖的特權，而留駐於鐵幕後面的美國人，却在他們的辦公室中，惱怒着，公開譴責他們是駐在國赤色政體的敵人。不論在鐵幕的那一面，他們為什麼不對那些仍打賭着民主主義最後必獲勝利的敵人，加以鼓勵呢？為什麼不對那些仍未將自己出賣給共產主義的小民們加以幫助呢？為什麼不再重新建立這些人們那已瀕消失的希望呢？美國如能實行這項政策，照我看來，當可為杜魯門主義準備一種思想的後盾。

歐洲的小民們——全歐洲——正殷切地等待着美國的音響在他們未和美國政策合作前，他們先要看到它是否合於理想。假使我們能使他們深信彼此是在一條線上的，假使我們能再給予他們某種事物，使他們的希望與信仰有所寄託，假使我們能令他們覺得他們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是無助的浮萍，我們可能在他們內心中再培養出一種新的毅力來。這種毅力是共東方那種有力的主義相抗衡，而終於將它克服。為了防止另外一次戰爭，這是將鐵幕自西方趕回它的老家——蘇聯的國境——去的惟一有效方法。

完

〔註一〕凱林斯基係俄時代最先策動革命的人物，沙皇政權即係由渠所領導之社會民主黨所推翻。

〔註二〕傑佛遜係美國第三任大總統，現時美國所根據之民主主義即係由渠所提倡所宣示之主義。